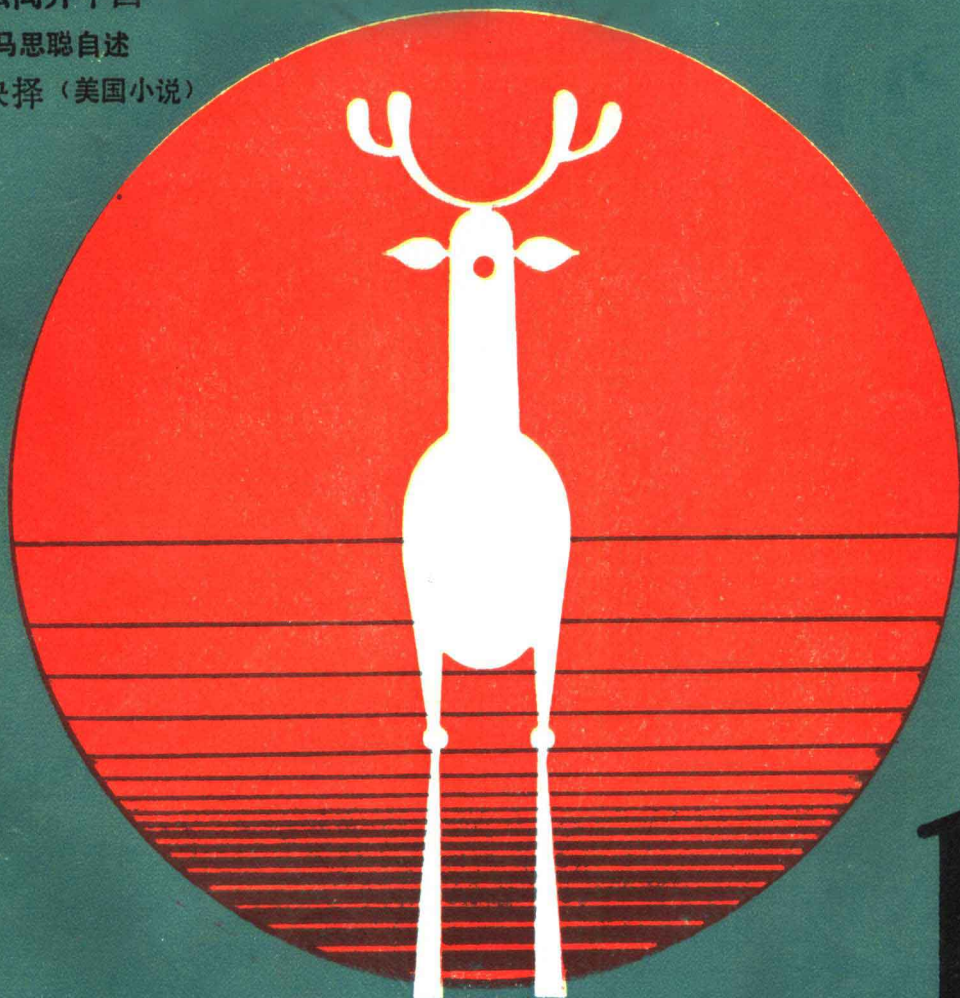


中外书摘

- 我认识的周恩来
- 苏加诺和他的妻子们
- 呱呱舞女的自述
- 我为什么离开中国
——马思聪自述
- 苏菲的抉择 (美国小说)



1

ZHONGWAI SHUZHAI 1985



裴多菲《老旗手》诗集插图

(匈牙利) 查纳第

中 外 书 摘

编 辑 《书林》杂志编辑部
(上海绍兴路 54 号)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上海商务印刷厂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出版日期 1985 年 6 月

书 号 17074 · 16

定 价 0.98 元

我認識的周恩來



尼克松在他任总统时，为中美建交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在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中，他认识了周恩来。1982年，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领袖们》一书中，回顾了这段历史交往。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三个人的历史。

在这三人中，我和蒋认识最早。我把他和蒋夫人当作朋友，而对另外两个人则不然。我们的关系是私交，也是同信仰、共原则的产物。但是赢得了大陆战争的还是毛和周。在这两个人中，周的眼光更具有持久的力量。简言之，周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他深刻地懂得权力的奥妙。所有这三个人都去世了，但是周留下来的影响却在现代中国日益占居优势。

1972年，我首次访问中国之前七个月，派了亨利·基辛格带着秘密使命去北京，为安排这次访问进行商谈。基辛格去北京之行的两天内，花了十七个多小时同周进行了直接、广泛的讨论。他回来向我报告说，他认定周可与戴高乐并列为他曾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外国政治家。

虽然基辛格讲话偶尔也有夸大之处，象我们大家一样，但他却很少背后过于赞许别的人。在我会见了周并同他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会谈之后，我就意识到基辛格为什么这样非同寻常地赞扬周了。

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一个才具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能够担当任何一种角色，或者把所有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而不给人以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地伺机换上假面具，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精明的人的不同的侧面，这个侧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的政治生涯如此漫长和政治经验如此丰富多采。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专家的冷酷无情，使他能够利用各种历史性的机会，并忍受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艰苦。儒家风度的个人品德使他能在外交折冲中出类拔萃，并成为千百万中国人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机敏，使他能够精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背后的各种力量。政治斗争能手的秘密行动，能够保证他的政策不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并且持续到毛以后的时代。调解人的策略和礼貌，使他在这些激烈分子企图使国家分崩离析的时候，保持统一。

所有这些品质的交互作用，使周能够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度过比列宁、斯大林和毛都要长的生涯。

周恩来的独特性格，是我1972年中国之行最强烈的印象之一。通过许多个小时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晤，我开始认识他，并非常尊重他。“恩来”译过来是

ACV17/01

“恩赐来临”的意思。这是一个简明地刻划出他的形象和性格的名字。周没有架子，但却很沉着坚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在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在全体会议上，他有意识地显得克制。他穿一身剪裁合体的灰色中山服，胸前口袋盖上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隔着桌子稳重地坐在我的对面。身子稍许前倾，两只胳膊放在桌子上，双手交叉着，他的右臂显然是萎缩了。这是在长征途中受伤留下的永远标志。他已七十三岁，可是往后梳着的黑发只略带花白。他那单波发式和那黑黑的几乎是地中海人的面部肤色，都不象是中国人的特点。

在正式会议上，他那轮廓鲜明的面貌一直保持着异常安详。周一面倾听着我发言，稍稍把头偏向一边，一面直接盯着我的眼睛。基辛格有一次把周比作一条静静地呆着、摆好姿态、伺机跃过来的眼镜蛇。有句过去常用来形容十九世纪爱尔兰伟大的爱国者查理士·帕尔内的成语，对周恩来也是非常适用的，他是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

周似乎未经翻译就听得懂我在说什么。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曾一度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并有实际知识。他甚至偶尔还纠正过他自己讲话的翻译，更好地表达他思想上的细微差别。他讲话时不用稿子，只是偶尔要他的某位助手参加讨论。他讲话富有逻辑性，很有说服力。为了加强他发言的力量，他微微降低声调，谨慎地点一下头表示强调。

他虽然由于体瘦而可能显得虚弱，但是他的精力却超过了许多比他年轻的同事。由于工作繁重，他在兼任总理和外交部长时，就以早起和工作到深夜而闻名。他常常在凌晨前接见外宾，一直谈到旭日东升。谈话结束时，总是象开头时一样地精神饱满，讲话还是那么透彻。

当我们在非正式的宴请和观光中搞得更熟的时候，周的表情更加豪爽，面部更是显得兴致勃勃。他常常是背靠椅子坐着，并充分发挥那一双富于表情的手的作用。当他要扩大他发言的范围或进行概括时，就用一只胳膊在前面扫动一下，当他要吧一个论据的各个要点组成结论时，就把双手的手指叉到一起。正式会谈中，周对言下的双关语发出低沉的微笑，但在交谈中对善意的笑谈，他却报以轻松的、有时是响亮的笑声。他的满脸笑容加深了皮肤上的皱纹，又似乎显出一种真挚的愉快，那时，欢乐使他的双眼闪出了光彩。

在国宴上，周和我彼此不用在这种场合的传统饮

料香槟，而是用茅台来祝酒。茅台是一种烈性的、浓度很高的米酒。有人曾幽默地说过，如果一个人喝了过多的茅台，餐后点起一支烟卷就会叫他爆炸。周当场用一根火柴点着了一杯茅台，来证明这种酒的易燃性，酒立即就在火焰中烧光了。

我们绕着宴会厅里同五十多位高级官员碰杯时，我注意到他只让酒杯碰一下嘴唇向每一位客人祝酒，谨慎地啜饮一下他的酒。我们两人仍然端着原来那杯酒回到我们的席位上。然后我们才喝了剩下的酒。周告诉我，在长征的特殊场合，他一天之内喝过二十五杯酒。酒性如此之烈，我听后真是惊讶不止。尽管由于他的年龄关系他后来只限饮两三杯。我记得曾谈到过，当红军在长征中经过茅台酒的发源地茅台村时，部队把当地的酒都喝光了。周用一种烈性酒推销员的眼光对我说，在长征途中，茅台是一种“万能灵药”。

周虽然是一位献身的革命家，但是看上去他和古老北京灿烂辉煌的皇宫并没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他以皇朝时代的圣人所具有的那种沉静与优雅风度往来其间。没有一个人在这种环境里看到他之后会想到“他是这一场运动的领袖，他的公开使命竟是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这里的装饰令人诧异地表现出对中国过去文化的尊重。宫殿是由名贵的中国风景画和古代金、银、玉制的手工艺品装饰起来的。这里看不到北京街头宣传牌上难听训诫的痕迹。

艺术和装饰巧妙精微，同周的性格和处理国务的巧妙精微很相称。周所具有的这种精微之处，大大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的 world 领袖，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这是由于中国文明多少世纪的发展和精炼造成的。这种精微之处也出现在谈话中。周细致地区分隐晦的涵义的细微区别；在谈判中也可以看出，他迂回地绕过可能引起争论的地方。在外交上，他有时通过似乎是琐屑事件来传达重要的信息。

周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繁琐的罕见才能。在我们到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我们被带去看体操和乒乓球表演。天已经开始下起雪来，而我们按计划次日要去游览长城。周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盥洗室了。随后我发现他是亲自去落实清扫去长城的道路的工作。第二天道路就干净如常了。这件事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发现周还亲自集合机场上欢迎我们的仪仗队。他们看上去都很强壮，个子很高，而且装束无可挑剔。他挑选乐队在宴会上演奏的乐曲。我晓得他事先研究了我的背景材料，因为他选出了许多我所喜爱的乐曲，包括在我就职典礼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此行之后，威廉·罗杰斯国务卿告诉我，有一次在同周会晤之前，一位年轻的妇女还给周送上过一份他事先安

排要登在头版的次日报纸的清样。

就周而言，伟大是注意小节的积累，这句箴言确实有几分道理。然而，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也总能够看到森林。

周的个性既然兼有儒家风度的个人品质和列宁主义革命家那种无情的政治本能，那末他就对担任这种政治角色是再合适不过了。就如同一块由几种金属造成的合金，它由多种元素合成较之任何一种单一的元素更为坚实有力。周的政治才能在于能够成功地扮演明争暗斗的能手和调和者这两种角色。

一个新闻记者有一次问周，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答道：“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共产党人。”周的同事们当然都是中国国民，但是他们大多数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周也深深地信仰他的主义，但是把这种信仰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

在1972年历史性会见之前许多年，周对一位记者说过，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正式关系，那是美国的过错。他说任何一个美国人在中国都会受到欢迎，不过这应当是互惠的。他又说：“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他强调说，“这是孔夫子说的，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把孔夫子作为一个权威来引证，对一个中国共产党领袖来说，似乎有些不相称。但是对于周来说，这件事完全符合他的特点的。孔夫子认为统治社会的“君子”和“士大夫”有才智、尊严、风雅、仁慈、决心和毅力。周的教养使他具备了这些品质。

这些品德使周处理个人的政治关系卓有成效。并帮助他同对手们共处了整整半个世纪。按照一度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的说法，周属于这样一类人，为人和顺，善于交朋友，从不走极端，总是能使自己适应现状。

周的儒家品德也使他得到了中国人民持久的爱戴。他是唯一获得“我们敬爱的领袖”称呼的政治人物。他的深得人心在中国政治中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这在他逝世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有一次电视短片里出现了这样的镜头：毛的妻子、极左分子江青在周的遗体前无礼，不肯脱帽，广东一群在街上看电视的人便喊出：“揍她！”

邓小平，这位周所选拔的副手，在悼词中那样高度颂扬这位已逝世的总理，致使这篇演说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极左派在标语中呼吁毛予以谴责，说“这个评价应该推倒”。毛那时在政治上虽然是同情左派的，但是据称他回答说：“对周恩来进行任何攻击都肯定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在周的追悼会上所做的悼

词里的评价不能改变。人民不支持把这个评价推翻掉。”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或许是在周掌权的年代中对他进行的最严峻的考验。

1971年，基辛格从他秘密的中国之行回来后告诉我，周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沉痛。这并不使人感到惊异。周作为第一代共产党领袖，他在革命中为达到平均主义的理想而斗争。他还是一位推行经济逐步现代化计划的领袖。因此，他一方面同情文化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中国如要在以后几十年满足人民和国防的最基本的需要，就不得不使它的经济现代化。

正如埃德加·斯诺有一次描述周的时候谈的那样，他是“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诗人”；当他看到红卫兵狂暴破坏他精心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时，一定会极其痛苦。

中国可以把周作为保住党和国家统一的伟大的调和者来追忆，而世界则将清楚地记得他是中国主要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谈判中他表现出本能的敏捷，善于运用国际力量的原则，并且有热烈的思想信仰带来的一种道德信念，所有这一切同他对外国的深入了解，长期的历史洞察力以及个人的丰富经验，在周身上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

斯大林令人生畏的外交部长维雅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有一次警告一个美国记者说，“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是难对付的，那么你们就等着有朝一日同周打交道吧！”当我们碰头时，我发现周并不是莫洛托夫描述的那种不妥协的谈判者。作为一个献身革命的共产党人，他把我们看作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是作为一个务实的中国人，他承认需要我们。

我同周一对一的正式会晤有十五个多小时，此外我们还一起在午餐、晚餐及其它公开活动上花了许多个小时。他有四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就是：他的精力、准备、谈判技巧和在压力下的沉着。

他的精力是非凡的，我注意到，在我们一些冗长的会谈中，双方年纪轻一点的人由于无间歇地开会而有睡意，翻译的声音也低沉了。但是七十三岁的周却始终都很敏捷，顽强而又机警。他讲话从不离题，从不拖泥带水，从未要求中途休会。如果我们下午的会议解决不了联合公报措词上的分歧，他也不把问题留给助手，而是亲自同基辛格不分昼夜地利用余暇消减分歧。第二天上午，他看上去还是好象刚从乡间度过悠闲的周末回来一样。他在处理涉及重大问题的艰苦工作中反而身心健旺起来。权力和责任感使他保持年轻。

他象我会见过的任何领袖一样，都是事先作好了充分准备。他在讨论之前就作好了种种研究，只是遇到一些高度技术性的问题才问助手。

基辛格对我说过，周的谈判本领会使我感到惊奇。他说得对。大部分谈判涉及象征性的问题和实质性的问题。在我同毛会晤之后，周和我坐下来举行我们第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周就提出了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来巧妙地测验我的决心，看看我是否由于来了中国而正在放弃我过去强烈坚持的旧观点。

他说，“正如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但是约翰·杜勒斯却不愿这样做。”

“不过你说过，你并不要同他握手。”我反驳说。

“不一定，我原来是不得不握的。”周回答说。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我边说边隔着谈判桌又一次握了手。

周似乎挺喜欢这个话题。他继续说，“杜勒斯的助手瓦尔特·贝戴尔·史密斯先生曾经想采取不同的作法，但是他没有破坏福斯特·杜勒斯的纪律，因而他不得不用右手端着一杯咖啡。由于人们是不用左手握手的，他便用左手摇了摇我的胳膊。”大家都笑了。接着，周又说，“不过，我们不会责怪你们。因为当时国际上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坚如磐石的集团，西方国家也是一个坚如磐石的集团。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并非如此。”

周坚韧顽强，但是在解决我们的分歧时却是灵活的。在联合公报谈到台湾问题的一节上，我们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台湾；他不愿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毫不含糊的要求。他想利用我们的联合公报把这个要求确定下来。通过双方达成的妥协，每方都以不带煽动性的语言来陈述各自的立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基辛格和周都立了大功。周的双眼总是盯着主要问题的，他知道同美国的新关系比在台湾问题上取得胜利更为重要。

在我们整个谈判期间，他从未表现出不沉着。周同赫鲁晓夫的滑稽丑态和勃列日涅夫的戏剧性表演形成明显的对照。他从不提高嗓门，从不拍桌子，从不为了压人让步而以中断谈判相威胁。我在1976年告诉周的妻子，她的丈夫总是坚定而有礼貌，就是当他“手里握有好牌”时也极为温和，这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把他的镇定沉着大部分归功于他的锻炼和经历，但这也反映了他那成熟的自信心。俄国领导人明显地认为，在助手面前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是很有必要的，而他是不以为然的。

周的谈话并不象毛的谈话那样富于色彩，但他多次用生动的形象来说明他的观点。在我们从机场乘车前往宾馆的途中，他简单明了地说过，“你的手是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那边伸过来的——双方没有往来整整二十五年。”

周是一个有造诣的诗人，有时就用一首诗来表明一个具体观点。提到1972年的总统选举，并暗示我有获胜的希望时，周谈到毛的一首题为《咏梅》的诗。周说，“在那首诗里，主席的意思是说，走出第一步的那个人，不一定总是伸出手来同你拉手的那个人。百花盛开的时候，也就是百花就要凋谢了。”周继续说，“你是那个采取主动的人，你也许不会在现在岗位上看到它的成功，不过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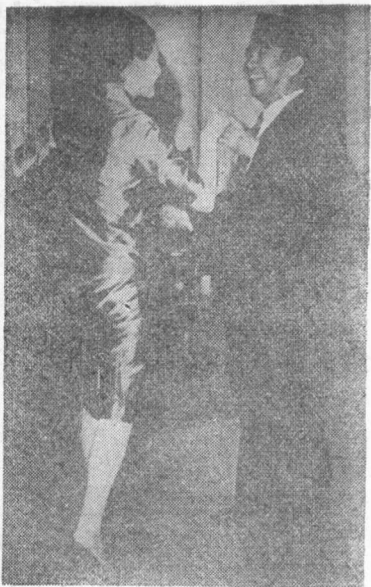
在我们于北京宾馆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周再一次用诗阐明了一个观点。他说，“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有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们来中国就担了某种风险。”周的诗境和毛的诗境一样，在伟大的领袖们中间并非不寻常的。政治学，从其最高的境界来讲，与其说是散文，毋宁说是诗。

周将以他的外交成就而博得崇高的声誉。他引导一个潜在力量远远超过现实力量的国家，虽然如此，他还是利用提供给他的各种机会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就。我在1976年周逝世后不久会见他的遗孀时，我对她说没有必要给他建立纪念碑，因为历史家们会把他维持全球力量均衡的行动看作是他的伟大的明证。然后我要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周的非凡经历：“你未能看到的常常比你看到的要更有意义。”

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它是否会幸存下来，而且最终做出的好事能否比坏事多，这要看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否象周那样决定，他们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更是一个中国人。他们如果这样做，中国在二十世纪里就不需要担心北方的苏联、南方的印度、东北的日本、甚至东面的美国。有着世界上最能干的十亿人民和庞大的自然资源的中国，不仅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领袖们”，〔美〕理查德·尼克松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陶贵福摘编）





苏加诺与本文作者辛迪

苏加诺和他的妻子们

如果读者想知道：象我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怎么会成为苏加诺传记的作者的？那么先得从1961年的春天说起。

1961年春，约翰·肯尼迪总统要我的丈夫、著名的喜剧演员和美国艺术家联合协会主席乔·亚当斯，率领国务院的一个文化交流团去东南亚。8月，乔约带着这个由二十五名各种演员组成的剧团出发了。我作为北美报业联合会的记者，随团前往。在这四个半月的旅行中，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演出了十天。在茂物的苏加诺的周末行宫里，我与苏加诺邂逅相遇。

我第二次见到苏加诺，是几天之后他在雅加达的宫殿里。这是一次私下会晤。当时，他正深陷政治危机之中。1961年10月，西伊里安发生动乱。由于他正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因此一概不见西方记者。但是出人意料，他竟赏脸与我作一次非正式的交谈。他对我尤其刮目相视，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则，我是一个敏锐而又卓越的政治记者，没有一个国家首脑会愿意放弃让我这样高能的记者采访的机会；二则，我是个姑娘。

10月17日早上九点多一点，我来到位于亚伦塞格拉街那座白色的大院门口。头戴红色贝雷帽、肩挎上了刺刀步枪的卫兵检查了我的请帖和证件，然后打开那扇大铁门。八个卫兵在我两侧正步而行，送我入门。他们把我交给几个身穿制服的侍从，再由他们把我引进苏加诺在莫迪卡宫内的豪华客厅里。客厅的地板上铺着厚厚的东方地毯。客厅的四角摆着无价的中国明代古瓶，此外还有一只日本的萨摩陶器、一对宋碗和一只精雕细刻的印尼神话中的鹰。

在这间犹如军械库的大房子中间，在他的等身巨像前稍靠右一点，站着苏加诺本人。他请我坐在一只垫得又厚又软的荷兰式扶手椅内，然后自己在我对面坐下。喝完一个女侍送上来的咖啡，我没有再多耽搁时间便单刀直入：

“阁下，您为什么老穿着军服？”

他举手弹去他那身银蓝色的茄克上想象中的一根棉絮，这件茄克上布满了金色的纽扣、空军徽章、肩章和一排排水果色拉，然后操着一口漂亮的英语说：“因为我是总司令。我的人民被荷兰人吐过唾沫。他们在殖民统治下过了好几个世纪。他们是奴隶。现在我们自由了。我必须给他们一个尊为权威的象征。”

当他滔滔不绝时，我歪着头，盯着他的眼睛，微笑着说：“宝贝儿，我看不是这么回事。你穿军服，是因为你觉得这样看起来漂亮一些。”

此话击中了他的要害。这位印度尼西亚的总统楞了片刻，然后仰面大笑，说道：“你说得对，不过别告诉别人。”

在此以前，大概还没有人用这种腔调对他说过话。但我一点也不感到紧张，我只觉得，我们开始建立了某种密切的关系。从那以后，这种关系在他那方面是献殷勤，而对我来说，不过是儿戏。我们继续交谈下去。十点钟，一个穿着点缀着金镶边、上了浆的白上衣的副官，打开了笨重的雕花房门。他僵硬地鞠了一躬，然后用印尼语很快地说了一句话：“阁下，时间到了，把她撵走吧。”不料，苏加诺把手一挥，命令道：“取消下面的约会。”“是，阁下。”这个副官躬身引退。以后每隔半小时，这一幕要重演一遍，直到十一时三十分。我们已经谈了快两个小时了。天气很热，房间里又不装空调，我的衣服已被汗水粘住了。我受不了了，也顾不上这个统治者是不能被人拒绝的，便宣布：“瞧，宝贝儿，也许你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做，我可得走了，我还得回去写一篇稿子。”

这位领袖显得有点惆怅，他环视四周，拿出一叠蜡防印花布作礼物，并送我到汽车旁。然后，他就象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总统会做的那样，吻我双颊。当我的车驰出庭院时，我回头看了最后一眼，他仍然站在台阶

上向我挥手告别。

我和丈夫结束这次旅行刚回到纽约，就收到了他的来信。这封信不是出自他的秘书或其他官员手笔，而是这位伟人亲笔手书的私人信件。他在信中，特意对我为他写的报道表示感谢。以后，我们断断续续地保持着通信联系，直到1963年。

1963年8月，我收到了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的一张条子，上面写道：“今天，在与苏加诺总统谈话时，我提及：应当赶快找人为他写传记。他说：‘我想等到我想这么做的时候。’他沉吟片刻，尔后孩子气地咧嘴一笑，说道：‘也许辛迪能为我写一部好传记。要是我想立传的话，只有一个人干得了，这就是辛迪·亚当斯。’”

二

1964年年初，我和我的丈夫第二次来到雅加达。这一次是专门为苏加诺写传记的。苏加诺约我于1月21日下午五点三十分会面。

我到他那里时，发现只有他一个人。这一次他的装束与上一次大相径庭。他拖着一双米色的拖鞋，穿着灰色的便裤和打过补丁的运动衫，正伸开四肢躺在客厅里的一张长沙发上。见到我后，他心不在焉地揉揉眼睛，象是要从沉思中醒过来似的。然后，他指了指自己裸露着的胸脯上的一个斑点，问我：“这是什么？”

“没什么，压根儿没什么，总统先生，”我答道，“这不过是皮肤下面的一个脓疱。”

“唉，……”他一声叹息，道：“这是年龄的缘故。从前我可没这个的。一上了年纪它就来了。我老了……老了……已经老了。”他平静地重复着。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又说：“做总统真是缩短寿命的工作，不管对谁来说，老了总不是好事。”他摇摇头，仿佛是要把自己摇醒似的，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累了，太累了。哦……辛迪……辛迪……辛迪……我累了。我不得不去体育场作一次演说。那里，我的人民正等着我再喊：‘打垮马来西亚。’我不能这么做，我已经同意停火……”

“但是你的公民不都是要想打垮马来西亚的，许多人要和平。”我说道。

他点了一下头，说：“可是这次会议是专为反马来西亚召开的。他们会对我的停火信息感到不快。”

我打算改变话题，于是问他，“你喜欢鲍比·肯尼迪吗？”

苏加诺的脸色开朗起来，“鲍比非常热情，他象他

的兄弟。我爱他的兄弟，他了解我。我曾经亲自设计并在宫中庭园内建造了一座宾馆，专为约翰·肯尼迪所用。他答应过我，要到这里来，作为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个美国总统。”他的声音突然低沉下去，“现在，他再也来不了了。”苏加诺大汗淋漓，一次次地捋去额头和胸口的汗水，接着又说：“告诉我，辛迪，他们为什么要杀死肯尼迪？”

我极力向他作解释：这不是什么有组织的仇杀，这不过是一个疯子干的事，但是他受过训练。

“那么约翰逊呢？他属于哪一类总统？”他又问。

“舆论认为他将是一个能干的行政首脑，在立法方面很有经验，并且……”

“我认识约翰逊，”他打断我的话说，“我在华盛顿会见肯尼迪时见过他。但我拿不准，他会象我的朋友肯尼迪那样喜欢苏加诺吗？”苏加诺的情绪正变得消沉下来。他说：“你知道吗？就在肯尼迪被暗杀的那一天，我的卫队长刚好到达华盛顿。他去美国是为了学习你们美国人是如何保护总统的。”

“哦，别担心。你不会遇到那种事的，宝贝，”我轻轻地说，“你不知道吗？上帝总是保佑黑心肠的罪人的。”

苏加诺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这是那天下午的第一次。他的眼睛开始闪烁快乐的光芒，迷惘的神色消失了。“你真使我高兴，”他笑着说，“你是我所需要的，也许这就是我感到浑身乏力的原因。哦，如此疲惫，几乎使我不能抬起一个指头来。”

也许他是不能抬起他的小指头。但是，当红晕出现在他脸颊上时，他有足够的气力举起他的整只手臂。他这么做了，他的手已经按在我的身上了。

对此，我是早有警觉的。我读到过大量有关此人寻欢作乐的文章。美国的杂志上把他称作“猎艳者”和“好色之徒”，法国的报纸管他叫“一个大诱惑者”，英国的记者们说他大约是一百五十个孩子（其中八个是合法的）的父亲。印尼的男人们对他们领袖传奇般的本领引以为豪。尽管如此，他的非礼举动仍使我吃了一惊，但又觉得这是意料之中的。当你和这么个活着的罗密欧密切接触时，迟早得过这一关。无疑，我是这出戏中完美无缺的女主角。在棕色的亚洲人中，我是洁白晶莹的外国人，身着漂亮的衣服，启齿微笑，全身充满着魅力。不过，我无意充当这种角色。这种不平衡的谈情说爱使我觉得好笑。我的幽默感油然而生。此时，苏加诺正困惑地看着我。

“我刚才在想，”我笑着说，“要是我掴你一记耳光，结果会怎么样？恐怕你会叫我尝尝镣铐的滋味吧。”

苏加诺的嘴角上露出一丝笑意，但是他并不打算

轻易放弃他的意图。于是我又说道：

“亲爱的，我欣赏你对我的殷勤表示，我知道亚洲人是好客的民族，你这样做不过是想让我知道，我是迷人的。”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心里，继续说道：“你的这种表示使我非常高兴，但这实在是不必要的。要是你不象着了迷似地爱我，我不会不高兴的。”

这个男人靠在椅背上，真正地狂笑起来。笑完之后，他问道：“你不喜欢我吗？”

“不，”我为了使他自尊心不致受损，说道，“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时，我就认为你是我所遇到的人中最生气勃勃、最充满魅力、最使人惊心动魄的人。”

“那么现在呢？”

“我仍然这样认为。”

“那么你为什么不放开刹车呢？”

“别忘了，我已经结婚。”

“我也如此。”他露出一笑。

“朋友，”我不无讥讽地说，“除了人所皆知的四次以外，最近你才有了第五次。”

“不！”他吼叫起来，“这是胡说！”

“好了，即使在四个老婆之间疲于奔命，你也可以称得上是该死的婚姻大王了。我还听说你在每个村庄的树丛后面藏着一个情妇。”

“那没关系，”这个总统吃吃地笑起来，“你也算一个，怎么样？”

“宝贝，你听我说。正是因为你非常引我注目，所以我才不能答应与你搞那些风流韵事。”

“我不明白。”他说道。

“事情正是如此，”我向他作解释，“我喜欢你。我对你的地位影响颇深。在政治上，你是世界伟人；在肉体上，你极具魅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让你毁掉你给我的好印象。由于我不希望你丢脸，因此你应该为我这样做感到高兴。”

苏加诺直楞楞地盯着我，说：“辛迪，你是我所遇到的最聪明的姑娘之一。在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被人以这种方式拒绝过。”

“行了，不过不要以为我不喜欢你。”我象哄孩子似的从我的手提包里掏出一盒五颜六色的口香糖，出其不意地将其中一红一绿两只一下子塞进这位总统张开着嘴巴里，随后我们笑着站起身来，手挽着手走出门外。当我们走到汽车旁时，他对我说：“明天这个时候再来。”然后，他眯着眼又加上一句，“问候乔约。”

第二天下午，守卫莫迪卡宫的卫兵不让我进去。我想我大概是走错了地方，于是要司机绕到内加拉宫。当我的车开到大门口时，两个卫兵跑出岗亭，用上了刺刀的步枪封住了大门。第三个卫兵横着步枪站在我的

的车头前，第四个用枪瞄准我那吓得发抖的司机，最后一个冲着我走来。我放下车窗，他把枪伸了过来。我要找他们的头。

苏加诺的私人卫队的队部设在铁栅栏里面。从他们急促的话语中，我弄明白，他们必须看到邀请书才能放我进去。我的坐车被卫兵们包围着，此时已过了五时三十分，总不能让总统干等着。我着急起来，用手拍拍我的表，搜肠刮肚地用印尼语拼凑了几句话：“我是辛迪·亚当斯夫人。今天五时三十分要与苏加诺总统会面。”“好，好。”他们连连点头，但是没有下文。又过了一刻钟光景，他们总算作出了决定。在十六名卫兵的簇拥下，我被带到“伟大领袖”的跟前。他目睹这出戏的全过程。眼下他正抱双臂，嘴上挂着一丝微笑，一看见我，便摇头晃脑地说，“啊，辛迪，辛迪，你总是惹事生非。”他边说边拖着步子向前，笨重地跌坐在客厅里的一把靠椅里，继续说道：“我刚才在主持一次令人伤脑筋的内阁会议。你走之后，我还有一次吵吵嚷嚷的高级咨询委员会会议。”

我没有理会他这些话，开门见山地说，“我要一张通行证，免得再遇到这种可笑的繁文缛节。”

我每次见到这伟大领袖，发现他的穿着一比一次随便。这一次他连鞋都没有穿。他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一双光脚板伸得老长。

“可以，我告诉办公室的迪亚明，他会给你一张长期的宫廷出入证的。”客厅里又闷又热，苏加诺满头大汗。他低头看看自己汗湿的衬衣，抱怨道，“这种料子肯定含有涤纶或尼龙成分，闷得我受不了。”他边说边解开了衬衣的纽扣。这么一来，这个素以服饰华丽著称的东南亚美男子，现在裸着上身，赤着双脚，光着脑袋站在我的面前。

“来，让我们到草坪上去，那里凉快一些。”他伸出双臂把我扶起来。当我站起身来时，他一把将我拉入怀里，吻我。

我实在是不喜欢接吻留下的吐沫。

“再坐下，宝贝。”我边说，边抹去被总统吻过的嘴巴上的口红。“我想现在是你和我作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的时候了。我没有必要力图声明我犹如修女一般贞洁，我也肯定不如您那样神圣。但是，我还不至于为了搞到一张通行证，要向一个总统做出超过献媚程度的事情来。我还没说，要是有一个中尉向我吹吹口哨，会使我多活一天。我可不是那种人。”

苏加诺没有打断我的话，他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听我讲下去。

“我是《十诫》的信奉者。尽管我不能完全做到，但是有几条我从未犯过。例如，偷和杀，也不习惯撒谎。”

“哈哈……不错，还有不应觊觎邻居的妻子。”苏加诺点点头，说道，“我对《十诫》非常之熟。在荷兰人的监狱里，他们允许我看的唯一书籍就是《圣经》。”他用力擦擦自己的脑袋，仿佛是要揩去他脑袋中的糊涂思想似的。“亲爱的，”他彬彬有礼地说下去，“只有一件事我是不能向它挑战的，这就是道德。”接着他又微笑着加上一句，“不过，当然啰，对可以发生的事，我是无能为力的。”



苏加诺与他的儿子冈特

听着，宝贝。坦白说，你的所有那些合法的或非法的风流韵事，对你这样的年龄来说，是致命的。因此，你不应当对我失望，而是应该感谢。”

“感谢？”他惊讶地抬起了他那刷子般的双眉，“为什么要感谢？”

“不错，”我笑着说，“你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你是个疲惫的老头。你把维持你的性感声誉视为自己的责职，这无疑是你引以为荣，并且身体力行的。但是，我敢打赌，你扮演一个狂热的恋人的角色，大概会使你病入膏肓。我还敢断定，实际上你已到了这种地步，你在生活中真正缺少的是一杯可口的热茶。”

苏加诺爆发出一阵大笑。他边笑边擦眼睛说道，“我可从来没遇到别人用这种方式同我说话。我对你不知如何是好。”

“要是我们的会面是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的话，我也不知对你如何是好。我是来为你写传记的，可是在我们几次会面中，我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写到你十六岁那年，我再也写不下去了。”

“是的，是的，”苏加诺说，“辛迪，我将永远爱你。你在我心目中将永远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感情是纯精神的。”他深情地俯视着我，说：“你可知道一个从未揭诸于世的最了不起的爱情故事？这是关于我与爪哇的一个公主真诚而又深切的纯精神的爱情。我非常爱她，但是决不能跟她结婚。这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一个平民领袖是不能和一个显贵的女儿结婚的。我深深地爱她，并将永远如此。多年来，我们保持着一种纯精神的关系，也许这是最真诚的最了不起的爱情。因为它永远不会变质。”他继续说道：“从现在起，我将把对你的爱看作是对我家庭成员的爱，我将把你看作是我的妹妹。”

这个印尼总统最后拍拍我的脸颊说，“来吧，这一次真的让我们到外面去，那里凉快。”

在草坪上，他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为他写传记的工作，真正开始了。

三

在为苏加诺撰写传记的过程中，我有机会见到苏加诺的几个妻子。第一个就是英吉特。

1923年，苏加诺还是万隆工学院的学生时，他们俩结了婚。当年，英吉特是一个非常漂亮、充满热情的女人，但是地位低下，没有受过教育。她比苏加诺大十二岁。当他们开始热恋时，英吉特正和她的第二个丈夫生活在一起，而苏加诺也是有妻子的人了。

我和陪同我的印尼官员来到万隆一所朴素的寓所前，一个瘦小的身影出现在门廊里。在我眼前的是一位端庄、整洁，非常娇弱的妇人。她虽说已七十出头，但是一头乌发梳得干干净净，光滑的发髻上露出珠宝首饰，手腕上闪烁着金镯的光芒。完全可以想见，四十五年前，当一个敏感的青年人见到的时候，她会是什么样子的。

英吉特家的客厅小得可怜，当陪同我的一帮本地官员把沙发、硬椅子和木凳坐满后，几乎没有插足的地方了。客厅的墙上挂着1932年苏加诺出狱后与英吉特和他们的养女的合影，使这间小小的客厅为之增辉。在其他几堵墙上挂着蓄着胡子的苏加诺在二十年代照的发黄的相片。写字台的抽屉里，有精心保管的他们俩早年在流放地的图片。英吉特仍然沉湎在过去的日子里。她的家就和她的思想一样，充满了对以往的回忆。

苏加诺是在与他十六岁的新娘厄塔莉离婚后，与同居的房东英吉特结婚的。二十年后，他与英吉特离婚，并同法特玛瓦蒂结婚。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漂亮的法特玛瓦蒂正和他们居住在一起。英吉特的心底里埋藏着许多往事，她的故事涉及大量隐私。但是她完全不会讲英语，对这种极为敏感的回忆，人们需要的是一种创造性的气氛，首先是单独交谈。只有当两个女性的思想相互交融以后，这种感伤的回忆才能克服羞怯和

眼泪。但是，眼下我们的环境是糟得不能再糟了。我们被许多陌生而又好奇的眼睛盯着。一个摄影记者绕着我们满地转。更有甚者，一个官员老是试图限制英吉特对我的问题的回答，使我只能按照他的意图获得资料。另一个障碍是亚洲人的传统。亚洲人讲话喜欢绕圈子，而西方人更喜欢直截了当。例如，当我问英吉特：“早年苏加诺是个忠实的丈夫吗？”在座的人听到这句话脸都全白了。

“恐怕聪明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一个在座者有礼貌地提出抗议。“不如让我们先问问她和她家里人的健康，然后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认为你的回忆能够有助于伟大领袖写传记感到光荣吗？’”

结果，我提出的问题常常被弄得面目全非。尽管这次采访不很成功，但是两个女人的心已经相印。当我站起身来告辞时，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怵怵发抖，眼泪从她那乌黑明亮的眼睛里涌出。两个小时以前，我们来自地球的东西两端，素不相识，而分别时已成为朋友了。

一天，在一次极为私下的宴会上，有一位淑雅温柔的爪哇姑娘坐在我身旁。虽然这位苗条女子非常年轻，不引人注目，也不发号施令，但是她的举止表明她的身份只能是“女主人”。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断然向她转过身去。这时我听她压低嗓音用英语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点点头，“你是哈雅蒂尔·苏加诺。”

她是苏加诺不公开的妻子，被严格地藏在幕后，从不允许在公开场合露面。隔着两把椅子，她的丈夫正密切注意着我跟她的接触，因为我们的谈话没有得到他的允许。

“在总统和我之间有一个空位子，你为什么不坐过来？”我向她建议道，“难道你不想挨在你丈夫的身边吗？”

“我的丈夫有另外三个妻子，”她柔声答道，“我们不过是1963年5月才结的婚。他认为此时不公开我们的婚姻关系为好。”

苏加诺正盯着我们。“我的丈夫看到我们亲热好象很生气。”她低声耳语道。

“我猜，做一个多妻丈夫的妻子不容易吧？”我没有理会苏加诺投过来的恶狠狠的目 光，继续对她 说。

“我的丈夫和我相亲相爱。不过，确也有许多不便之处。”她同意我的话，继续说：“他六十三岁了，我呢，二十三岁，而且不允许我跟他一起住在宫里。他说，现在对我来说，住在外边更合适，所以，哈蒂尼^①是官方的女主人，会见来访的官员，黛维^②总是干那些迷人的

事，而我却必须呆在幕后。我孤独极了。”

“你能常常见到他吗？”

“能见到的，”她缓缓地说，“他把什么事都告诉我。比如，我知道你和你写的那本书的事。”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我的丈夫还告诉我，他要带我去你的国家，到纽约去。那就是为什么我想要见你，并和你谈话。”

我瞟了苏加诺一眼。他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我回敬他一个神秘的微笑。

“有好几次，我虽没有见到我的丈夫，但是他给我写了表白爱情的字条。”她热切地说，“有一个周末，尽管他和哈蒂尼一起住在茂物，但是他给我送来一封信，信中说：他有多么爱我，时刻惦念着我。他非常需要我，所以我们之间才能爱得如此深切。”

“辛迪，过来。”苏加诺打雷般的声音终于传来了。“你不要提及涉及私事的问题，听到吗？她是不能写进书里的。”

“你可以放心，宝贝。”我对他说，“我对你在家玩弄谁并不介意。至于你的那本传记，只涉及你个人，我不过在交朋友。”

“好，我相信你。”他偷偷地看了他的妻子一眼，问道：“她跟你说了些什么？”

“她期待着带你她一起去纽约参观世界博览会。不过要是你有兴趣的话，我还可以告诉你，昨天哈蒂尼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哦，……”他有点张皇失措地说：“那我该怎么办？你得帮帮我的忙。你必须把哈蒂尼和哈雅蒂尔想去美国的念头打消掉，因为我想跟黛维一起去。”

我答应他尽力而为。此后，哈雅蒂尔和我见面多次，他再也没有横加干涉。

由于我和苏加诺关系密切，引起了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谣言。有人认为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有人把我看作是赤色分子，还有人说：如果我不是地道的赤色分子的话，那么必是苏加诺的情妇无疑。人言可畏，我该怎么办呢？有人告诉我，只要能打入哈蒂尼的社交圈子，便可阻止邪恶的谣言四起，因为她是拥有政治实力的妻子，而且对苏加诺影响颇大。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曾向苏加诺提议：让我与哈蒂尼接触。苏加诺听了后连连摇头，说：“哦，不。要是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场的话，哈蒂尼会嫉妒的。”这位总统以粗暴、顽强闻名于世，但是，一遇到女人便软弱无力。他怕跟他的妻子们闹翻，因此极力避免可能引起矛盾的事。不过，最终他还是被说服了。

由于苏加诺的第一夫人法特玛瓦蒂生活在雅加达，而黛维也住在雅加达，因此哈蒂尼便占居了雅加

达以南约一小时路程的周末别墅。直升飞机只用十分钟,便把我送到一个池塘边的草坪上,然后驾车来到一幢隐没在灌木林丛中的房屋前。

哈蒂尼长得端正优雅,身高约五英尺三吋,但是很匀称。她站在门口迎接我。我一见到她便说:“我一直在担心,你不会忘了我们的约会吧。”

“不,”她微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总统今天早上又一次打电话给我,提醒我不要忘了。”

预料到我迷人的魅力在这种场合下不一定管用,我冒昧带去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一只串红珠子的女用钱包,一瓶她所喜欢的香水,各式各样的唇膏以及一只和我所用的完全一样的黑色小牛皮包,她曾对这种式样的手提包赞叹不已。哈蒂尼回敬我一顿午餐,蜡防印花布和一只金手镯。

很快我们变得无话不说了。她问我保持苗条的秘密,以及西方防老的新方法。哈蒂尼四十多岁,已是做祖母的人了(她与前夫生的孩子已经结婚),奢侈的生活使她出现老态。但是她仍然不断地与总统年轻的妻子们竞争。

“总统很爱我。不过他是个忙人,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兴趣爱好。”她充满柔情地说道。

我觉得她需要得到安慰,便说:“总统非常爱你,就在今天早上他还告诉我……”

“怎么?今天早上你见到他了?”她问道。

我感到她可能是误会了。连忙说:“我是来这里之前见到他的。”

可怜的哈蒂尼,每星期只能见到他的丈夫一次。表面上她从来不打听苏加诺其他妻子的事,骨子里是非常想知道这方面的消息。



苏加诺的妻子黛维
(左)、哈蒂尼(右)

她招呼我喝了点饮料,又尝了尝点心,然后问我:“今天早上有谁和他在一起?”当她知道她的情敌们一个都不在场时,脸上显出宽慰的神色。“他看上去怎么样?”她接着又问我。

“很好,哈蒂尼,他就和往常一样漂亮。”

她微笑起来,“的确,他非

常漂亮。那么你每天见到总统吗?”

“噢,不。”我为了减轻她那种不可名状的巨大痛苦连忙否认。

“他对你谈起过我吗?”

这下我如释重负,忙说:“他总是提到他对你的爱。”

这句话把她脸上紧张的表情一扫而光。她把话题转到总统对女人的癖好上。我觉得她这是想看看我在这方面知道些什么。当她确信我既不知道,也不打算告诉她这方面的消息时,便收起了这个话题。但是我跟她的这次会面是成功的,看得出来,她已把我当作她的知心人了。

四

1965年10月初,我刚回到美国,就听到一条消息:雅加达发生政变。随后又听说发生了反政变^⑨。这个事件发生后一个月,我为苏加诺写的书——《苏加诺:一部自传》问世了。

第二年1月,我到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部工作,并被允许进入印尼。我的第一项使命便是单独会见我的朋友——苏加诺总统。

我和我的丈夫乔约到达雅加达时,那里仍然是一片火药味。机场上没有人来接我们。机场的四周全被路障包围起来,没人进得来。我们还被告知,非常可能连我们也出不去。我想打电话,但是通往总统府和旅馆的线路都已被切断。

几小时以前,苏加诺采取了一项提高自己声望的戏剧性行动。他挣脱了军方加在他身上的锁链,宣布内阁改组,所有的左派部长都被揽入内阁。他开除了他的敌人纳苏蒂安将军,而他的朋友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留任。纳苏蒂安在长期沉默而现在嗓门最高的右派势力中深得人心。

我们到达时,约有两千名学生,其中三分之一是姑娘,正在举行一次群众性示威。他们戳破汽车轮胎,又开双腿骑在公共汽车和卡车的横栏杆上。交通完全瘫痪了。学生们用油漆刷在沿途每一辆小汽车上,推翻空汽车。全副武装的军人乘着卡车绕圈,维持秩序。

在混乱中,乔约设法找到了一辆破车,并与司机商妥把我们送到旅馆去。司机避开主要街道,经过一条胡同把我们送入市区。但是在一条十字路口一群学生蜂拥而上。他们在我们车的挡风玻璃上刷标语。这些标语是:“打倒苏加诺!武装部队万岁!”我们是这一地区的唯一外国人。对我们进行盘问后,几个头头的认为可以放我们走,并在我们的车上用粉笔写了几个

大字：“不要损害这辆车。”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结果花了我们两个小时，但是我们总算到了旅馆。

虽然离开这里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周围的一切都变了。第二天早上，在去总统府的路上，每个路口都有装甲车、吉普车和铁丝网。总统府半英里之内的所有通道上，都设有重重路障。总统府门口，卫兵的步枪已被两门加农炮取代。在此以前，我还从来不曾见过如此森严的保安措施。

从外表上看，苏加诺仍是老样子，只是比以前疲惫得多。他双手不停地拨弄眼镜，对我说：“有一名长期反对我的军官，最近读了你写的那本书，跑来见我。他对我说：‘也许你做的许多事我从不赞同，但是现在我知道你在早期是如何为我们作斗争的。我意识到你为了我们的自由，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在殖民统治年代，你为了你的信念，选择了坐牢和流放。我对我曾经反对过你深表遗憾。我将再次把我的一切重新奉献给你。’”

苏加诺深情地看着我说：“对此，我向你深表谢意。当然，也有人反对这本书，但是大多数人喜欢它，包括我。人们认为这本书写的正是苏加诺，字里行间都是我的声音。”他说：“我已下令，将这本书译成印尼文，不许改动一个字，要印刷成千上万册。重要的是务必让外界读到它，特别要让我人民看到它。尤其是在此刻，当有人反对我的时候。有人说：苏加诺的这幅肖像并非完美无缺。也许是如此。但是我是人，我不是没有缺点的，我犯过错误。但我需要的是真实的我，历史最终会作出判断的。”

第二天晚上，我们应邀去茂物。乔约悄声问我：“为什么我们没有象往常一样提前一小时受到邀请？”

“也许是哈蒂尼觉得不快。注意她的脸色。”哈蒂尼的脸色不好看，绷得紧紧的，没有一丝笑容。

这是几个月来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我穿过人群，伸开双臂向她走去。但是她转身走开了，仿佛是没有看见我。她对乔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亲热，对每个人都点头打招呼，但是把我当作苍蝇一样，不屑一顾。总统和她不同。他看见我们，便径直走来，当众吻我两颊，接着拥抱乔约，热情地握住了他的双手。总统在众目睽睽之下确立了我们的地位。当我们一起向大厅的另一头走去时，哈蒂尼突然停住脚步，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你胆敢在书中那么少提到我，却在法特玛瓦蒂身上用了那么多笔墨？我待你这么好，你却把我看得如此低贱！”

我没有争辩，我们俩只是互相盯了一眼。我无法告诉她真相。我不能对她说：“总统要我作出保证，不要过多地写她，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其他妻子会嫉妒的。”我不能背叛总统。乔约对我说：“现在最好是避开她，等

她气消了再说。”但是哈蒂尼不想轻易放过我。她把我从座位上叫了出来，并拉我到屏风后面，这样总统就看不见我们了。

“他恨法特玛瓦蒂，”她气急败坏地说，“而他爱我。你为她写了好几页，而我只有几行字。我的朋友说：‘你做得太过份了’。”

“不过，哈蒂尼……”

“我的朋友告诉我，你这么做只是因为法特玛瓦蒂亲西方，也就是美国，而我亲左翼。她还说这是政治。你是故意这么干的。”

“瞧，哈蒂尼……”

“我决不会原谅你的。”

“听我说，哈蒂尼，”为了不致再次被她打断，我又快又急地说下去。“你完全知道，没有理由去嫉妒法特玛瓦蒂，因为总统不再跟她住在一起。我多写了她几句，只是因为早年她曾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她生了总统的第一个儿子，现在她是总统五个孩子的母亲。她和总统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日本占领印尼和印尼反抗荷兰人的时期，她又是苏加诺成为总统时的第一个妻子。她和印尼的第一面旗子联系在一起，她确实是印尼历史的一部分。”不过我还没敢说：“你应当感谢我。”因为苏加诺曾要我在书中也提一提他另外两个妻子，但我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这时，苏加诺从屏风的折角处偷看到了哈蒂尼对我发脾气的一幕。我连忙向他作解释：“我正在告诉哈蒂尼，法特玛瓦蒂在书中的地位突出，仅仅是由于她是印尼历史的一部分。”

“我所爱的哈蒂尼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凑在她的耳朵边柔声安抚道。接着，这位玩弄平衡术的大师挽起她的手臂，吻她脸颊，把她带走了。我注意到，那天晚上，他一直在抚摸哈蒂尼的手臂或她的头发，不断地吻她。但是趁她不注意时，他时时向我微笑，或是挥手示意。他既要抚慰她，又要使我觉得：“我的书是出色的。”但是哈蒂尼整个晚上没看我一眼。在总统的允许下，她与乔约起劲地跳舞，并且出格地把乔约的位子放在她的身旁。

五

1966年3月的上半月，印尼的政局瞬息万变。苏加诺的左翼内阁在学生的压力下垮台了。一个新内阁组成，接着又倒了。四个星期中换了三次内阁。雅加达的市民们根本弄不清明天会是谁在台上。星期四还是大权在握的人，星期五成为国家的敌人。星期一中国人是引起恐怖的罪魁，而到了星期二却换成了美国人。一天，五百名暴徒闯进中国大使馆，把里面的桌子、

椅子、电扇、电灯等砸了个稀巴烂。他们推倒华人住宅的大铁门，冲进大院，殴打四处奔逃的中国人，向他们投掷石头，砸毁门窗，掀掉官员住宅的屋顶，偷走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可是，第二天早上，当我路过美国大使馆时，看到大约同样数量的年轻人正在进攻美国大使馆。他们向使馆扔土制炸弹，用石头砸玻璃，点火烧汽车，毁坏美国的鹰，撕下星条旗。

混乱无处不在。总统发表演说，赞扬武装部队。武装部队在报纸上称颂总统。学生们公开批评总统，军队暗地里为学生们叫好。军方不再把苏加诺奉若神明，现在陆军领袖苏哈托是受人尊敬的人，被称为这个国家的父亲。知识分子认为政府必须作出变革，然而他们不敢使用暴力把伟大领袖赶下台。同时，新的力量正在集结，他们指责苏加诺应为此国家的全部失败负责。

到了3月中，所有的人都缠上有颜色的布条。白色意味着你拥护苏哈托，红色表明赞成苏加诺，蓝色标志着与学生结盟。动乱正在升级。反共的学生试图重新猛攻总统府。雅加达电台宣布：“总统、总司令、革命的伟大领袖、总理苏加诺已指示苏哈托将军采取必要的行动，恢复这个城市的秩序和平静。”第二天，走投无路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一项文件，把总统实权交给了苏哈托。

3月12日，军方发布命令取缔亲共组织。3月16日，军方掌握了电台、电视台、报纸以及其他宣传工具。3月17日，雅加达出奇的平静。我打电话到总统府，总统的四个副官都“不在”。我再把电话挂到莫迪卡宫，那里说他们在茂物。当我与茂物联系时，那里的人又说他们在内加拉宫。当我继续问苏加诺总统在哪里时，电话线路马上被切断。我感到情况不妙。果然，第二天，军方逮捕了现任政府的成员，雅加达处于军管之下。美国人接到警告：呆在家中。这个国家对外、对内的电话电报全部被切断。民用机场被军人接管。未经许可，任何飞机不得飞越雅加达的上空。机关枪架在每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楼房顶上，到处可以看到坦克、军人，不时传来枪声。十五名左派部长遭逮捕，其中有几个是被学生抓起来后转交军方的。军方控制的雅加达电台声称，这些部长们已被“保护性拘留”。但是从此没有下文。

在一场为他的政治生命而战的搏斗中，苏加诺被锁住了手脚。不过，这只是他所面临的问题中的一个。

接到了他的呼救信号后，我赶到了总统府。在那里，忠于苏加诺的红色贝雷帽卫队已换成了效忠苏哈托的蓝色贝雷帽伞兵部队。要想进入总统府，必须持有



辛迪和黛维(右)

军事长官手令的证明，总统的邀请和证书也不顶用了。

总统一见到我，便扑了过来，抓住我说：“我遇到麻烦。”他边说边跌进一把椅子上，一副完全垮掉的样子。“我的妻子，黛维，因为你的书里没有提到她，正在大发脾气。”

“我的书？”我惊讶得喊出声来。

“在整个世界上，婚姻生活是我最大的问题，现在黛维正在生气，你一定得解决这个问题。”

“她在对谁生气？”我问道，“你是说黛维在生我的气？”

“不，”苏加诺说：“我不是想说黛维正在生你的气，而是她在对你大发雷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叫了起来，“别忘了，这是你的错。”

他无可奈何地点头，“不过请你务必帮帮我忙的忙。”他恳求我。

黛维，印尼人称她为“进口的妻子”，现在正赌气住在离总统府几分钟路程的一座豪华住宅里。她是日本人，1959年与苏加诺结婚，但是他们的婚姻关系直到三年之后才公开。她现在是二十九岁。黛维是个才貌出众的女人。长得像个模特儿，但是聪明极顶。她对周围发生的事了如指掌，谁都骗不了她。

我们坐下来，一谈就是几小时。她告诉我：她所以跟总统结婚“是因为他的神色是如此悲哀”。她说：“总统以他的服饰华丽、富有魅力著称。他常常以他那著名的微笑自豪。其实并非如此，这是总统做出来让人看的。在这种假象的后面，他是个孤独的人，郁闷不乐，经常失眠。”

“我在东京帝国旅馆的一次宴会上，由一些日本商人介绍与总统相识的。当时，苏加诺跟我说笑话，并且放声大笑。但是当他转身走开时，我凝视着他的侧影：他宽阔的肩膀突然塌了下来，直挺挺的姿势不复存在。看上去他是如此的孤独、软弱、沮丧。”

我问她，她是怎么到雅加达来的。

“总统邀请我来住两个星期，”她用微带日语口音的英语继续说道，“然后我们就结婚了。开始的时候，真是太可怕了。我在这里举目无亲，没有朋友，甚至也没有人打算喜欢我，因为我是外国人。我真是不幸。”

“不仅普通人不喜欢我，而且还由于我在政治上非常倾向于西方，而众所周知哈蒂尼是非常左倾的，这对我来说非常危险。她恨我。她是大权在握的重要夫人，宫廷卫队听她的，他们暗中监视我，嫉妒包围着我……”

黛维喝了一口手中的香槟，继续说道：“我是如此孤独，我已失去了我的整个家庭。我那守寡的母亲因我的婚姻，极为不快。我皈依伊斯兰，并与总统结婚后不久，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同一天，我唯一的兄弟自杀了。一天之内，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除了总统以外，我孑然一身。”

“此外，由于考虑到娶了一房新的妻子这种微妙的处境，总统在最初几年中与我保持着一种秘密的婚姻状态。我不得不住在一所小屋内，根本享受不到与国家元首结婚的所有特权。那些日子中唯一的好事，是总统提供我膳食，给我烟抽，还带一些水果来。”

在这几小时中，黛维对我几乎无话不谈，显然她已把我看作是她的好朋友了。我取得了成功。

在这关键性的日子里，苏加诺紧紧地拉住黛维。她的身上有两种极具魅力的品质：一方面她是一个美女，而且非常聪明；另一方面，她选择站在获胜的一边。当哈蒂尼正在谈论东方集团结盟的过时方式时，黛维正在访问西方；当哈蒂尼憎恶纳苏蒂安时，黛维正在扮演他的“暗中保护者”的角色。苏哈托被任命为高级职务的唯一理由，是苏加诺不喜欢纳苏蒂安这个未加冕的军方政治领袖。但是黛维狂热地说：“纳苏蒂安将军是我见到的男人中最杰出、最有道德的。至于苏哈托将军，我会称他为劲头十足的人，在每个方面堪称典型的爪哇人。”

有鉴于此，黛维现在可以减轻苏加诺受到的压力。在那些变幻莫测的日子里，正是她与苏哈托一起打高尔夫球，起到联络的作用。虽然她不会大力击球，但是当她们穿着紧身裤时，显得分外漂亮。正是她与纳苏蒂安保持联系，也正是她通过我与新任的美国驻印尼大使挂上钩。在反美浪潮汹涌时，又是她假装拜访日本朋友，偷偷地溜出他们家的后门，钻进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去找她那些亲西方的朋友们。

在关于苏加诺是否卷入1965年9月30日政变的问题上，是黛维提供了证据，证明苏加诺与此事无关。她告诉我：“总统对这次政变一无所知。头一天晚上他在雅加达的斯纳延体育馆作演讲。午夜前后，他乘车来

到旅馆，我正在那里与伊朗大使夫妇共进晚餐。我带了一名卫兵下楼，并和总统一起乘车回家。一时三十分我们上床。象通常所做的那样，总统起床很早，正当他打算去总统府时，他的副官冲了进来，告诉总统发生了政变。这时正好是六时三十分。总统大吃一惊，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

第二天我去见苏加诺时，发现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的一把椅子上，默默地凝视着花园。多年来，他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现在这个时代突然结束了。他再也用不着对我说：“真对不起，我还有其他的事。”这天，我等着他打发我走，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一直到十二时半，我暗示他：我得走了。总统看看手表，喃喃地说：“不错，我想我也该走了。”

他感到异常孤独。这种孤独感的产生，是由于他不知道身边还有谁是可以信赖的。也许是因为他的挚友苏班德里约被捕了，在他身边留下了一大块没有填补的空白。苏班德里约是在肉体上被关在铁窗内，而苏加诺是在精神和思想上被锁上了铁链。

眼下，他还要为黛维的事烦恼。与《圣经》不同，《可兰经》要求穆斯林平等地对待他的每一个妻子。这使苏加诺大伤脑筋。他把周末给了哈蒂尼，其他的日子，他试图在黛维和哈雅蒂尔之间分身。还好他见不到第一夫人法特玛瓦蒂。她病了，正在伦敦治疗。不过即使在她去伦敦之前，他也极少见她。法特玛瓦蒂是多余的妻子，苏加诺不想与她离婚的原因，是这样可以把他和法特玛瓦蒂生的五个孩子联结在一起。这五个孩子都跟他们的母亲亲近。

六

苏加诺变得很厉害，他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讨论政治问题了。有一天，我在黛维家的餐桌上向人介绍外交部的一位名流，说他就是西伊里安政策的设计者。不料苏加诺突然转过身来，用我从未见过的粗暴态度一拍桌子，大声嚷道：“西伊里安政策的设计者是苏加诺。苏加诺是印尼自由的缔造者，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是这个民族的缔造者。苏加诺是这个国家的总统和总理。每个人必须记住这一点。”

他的这次发作使我认识到，这位伟大领袖是决不会让位的。其他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天，新任命的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对我说：“请帮个忙，设法让苏加诺出国旅行几个月。这也许对大家都好。我们可以接管国家政权，他也能挽回面子。我怕跟他提这事，所以想请你劝劝他。你还可以告诉他，我们可以作出私下保证，他回来以后仍可保留他的位子。”

结果是黛维劝她的丈夫放弃职责，出国度假。她这

样做,也许是她对新当权者感到痛苦,也许是出于妻子对丈夫健康的关心。她发现他经常闹头痛,记忆变坏,几个月前还出现过轻度的精神崩溃。但是苏加诺就象任何其他时代伟人倒霉时那样,总是把眼前的挫折看成是暂时的现象。在他的想象中,一次重大的反击将接踵而来。他说:“不!我不能走开。这个时机的选择是错误的。苏加诺决不逃走。以后我也许会退休,但不是现在。”

但是,形势的发展完全不象苏加诺所期望的那样。1967年2月17日,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执行委员会在纳苏蒂安的主持下,否决了苏加诺的一项施政报告。三天之后,苏哈托由各武装部队司令陪同来到总统府,他们和苏加诺会谈了三个小时。在这次短兵相接中,苏加诺再次屈服,被迫将其全部职权交给苏哈托。3月份,苏哈托被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任命为印尼代总统。

苏加诺被废黜之后,先是被软禁在茂物,后来又被迁到雅加达市郊。这时,他已完全与世隔绝,过着最孤独的生活。黛维在他被废黜之前就离开了他,并于1970年初与他正式离婚。哈雅蒂尔也跟他离了婚。苏加诺不但被剥夺了所有权力,而且被切断了人生必不可少的同外界的联系,他的体力和智力逐渐衰退。后来他只是在他女儿的婚礼上,以及在法特玛瓦蒂家里很少的几次家宴上露过面,此时他已老态龙钟,走路需要旁人搀扶,连讲话都含混不清了。最终,法特玛瓦蒂也同他离了婚,只有哈蒂尼仍然是他唯一合法的妻子。

◁~~~~~▷

当代领导者的艺术

一、以本人的职业和他所拥有的知识做基础的坚定意志。没有一个追随者希望被一个缺乏自信和勇气的领导者所指挥,也没有一个明智的追随者,会被这种领导者指挥很长的时间。

二、自我控制。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人绝不能控制别人。领导者的自我控制将替他的追随者立下一个范例,使他们可以模仿。

三、正确的敏锐感。如果缺少公平和正确的感觉,没有一个领导者能够博得并维持他的追随者的尊敬。

四、固定的决心。一个决心动

五、固定的计划。成功的领导者必须有计划地工作,并要求他的追随者执行他的计划。一个只靠推测来行动,而没有固定计划的领导者,就好比一只没有舵的船一样,它迟早会搁浅的。

六、愉快的人格。没有一个懒散、不谨慎的人能够成为成功的领导者。追随者不会尊敬一个没有愉快人格的领导者。

七、同情心和了解。成功的领导者必须对他的追随者富有同情心;而且他必须了解他们每个人以及他们所遇到的难题。

八、熟悉细节。成功的领导者

1970年6月16日傍晚,苏加诺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很快被送到雅加达陆军医院。6月21日,星期日早上,苏加诺黯然去世。

临死前,苏加诺曾表示要见黛维一面。在他去世前一天,黛维飞到雅加达,并带来了替他生的,但他从未见过的女儿。苏加诺去世的当天,黛维和哈蒂尼一起恳求苏哈托将苏加诺葬在他在茂物家中的花园里。苏加诺生前选中这个地方长眠,因为他相信附近石碑上铭刻的十五世纪碑文,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源泉。但是苏哈托不愿把苏加诺的墓放在雅加达附近的地方,拒绝了她们要求。第二天,苏加诺的遗体被运到勿里达,安葬在他母亲的墓旁。

(《我的朋友——苏加诺》,〔美〕辛迪·亚当斯著,新加坡1980年英文版;《苏加诺》,〔美〕辛迪·亚当斯著,伦敦1972年英文版;袁翰林编译,董微华校)

① 哈蒂尼是苏加诺的第二夫人,1953年与苏加诺正式结婚,以前是一个军人的妻子。

② 黛维是苏加诺的第三夫人,1962年与苏加诺正式结婚,以前是一日本酒吧女郎。

③ 1965年9月30日,苏加诺卫队一营营长翁东中校指挥左派军人,捕杀了六名著名的右翼将领。第二天,陆军战略后备指挥部司令苏哈托中将发动了一次“反政变”,翁东等人先后被捕下狱。

摇的人,会显示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当然不能很成功地领导别人。

必须熟悉各项工作和计划的各种细节。

九、自愿承担全部的责任。成功的领导者必须心甘情愿地承担因为他属下的过错和缺点所带来的责任。如果他想推卸责任,他将不会稳坐领导者的宝座。

十、合作。成功的领导者必须了解,并使用合作的原则,而且还要能够诱导他的属员做同样合作的事情。领导需要力量,力量需要靠分工合作才能产生。

十一、对属员要宽容和富同情心。人可以暂时地跟随暴力领导,但是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以智聚财》,〔美〕拿破仑·希尔著,吴洋海译,香港广源出版社出版,习摘)

“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事无疑是成功的，那就是我和萨特的关系。三十多年来，我们之间只有一次在睡觉前失和。”

——西蒙娜·德·波伏瓦

“我认为她长得很美。我一向觉得她十分美貌，即使我与她初次相见时她戴着一顶丑陋难看的小帽。我和她一见面便倾心相爱，因为她漂亮，她有一张至今仍然使我感到魅力的脸。她身上具有一种奇妙的气质——她的聪明才智堪与男子媲美（尽管我说的这句话带有那么一点儿封建主义的色彩），她也具有女人特有的敏感性。这就是说，从她身上我可以找到我需要的一切。”

——让-保罗·萨特



萨特的 爱情生活

让-保罗·萨特曾经开玩笑似地宣称说，尽管利莫桑高地上的低洼潮湿处撒满了过多的“叶绿素”，也没有哪一本书比得上在那上面散步的时间长，而两个人在一起娓娓谈话的时间则更长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每天早晨来和他会面，只要她有片刻时间与家里人分开，就急匆匆地穿过挂着晨露的草地，奔向他和她秘密约会的地点。两人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朋友啦，书啦，生活啦，当然，还有他们的将来。他们长时间地并肩漫步，八月的静谧田野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身影。她的个子较高，身材纤秀。而他却是矮个子，胸肩宽阔结实，这位中学教师的眼睛后面一只右眼是斜视眼。他常常纵情大笑。他们俩都刚刚当上教师，在大学里都是各自班上首屈一指的高材生，毕业后在工作中勤奋努力的程度也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恋人相会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她该回家吃午饭了，而他却坐在灌木树篱下，吃点奶酪或姜饼聊度一餐。这些食物是西蒙娜的表弟马德兰从她家厨房里偷出来带给萨特的，他乐于这样做，因为他敬慕一切具有浪漫气息的事情。到了下午，他俩又凑在一起了。旧话重提，或者继续讨论放假前在巴黎开始探讨的疑问，或者接着讨论午饭前在栗树林里的话题。她对父母谎称说，她和萨特一块在构思写一本书，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研究。她这是为了迎合父母亲对共产主

义的仇恨心理，才找了这么个借口来掩饰自己的约会。不知不觉中，太阳又在河对岸的群山间沉下了，夕阳伴送她回家，也将他送回旅馆去，混坐在一群旅行推销员中间吃晚饭。

萨特从十岁时起开始写作——短篇小说、诗、散文、讽刺短诗、双关语、民谣，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每当他遇到一位姑娘，总会反复地劝她们也“应该写作”。他说，人只有创作想象型的作品，才能逃避世俗的生活。然而艺术和文学又都是绝对物，他无意成为一名专业的文学家。

有许多事情是萨特所不愿做的。他不愿被家室拖累，从来没有打算过要结婚，也不准备定居，更不愿意为了财产而使生活变得平庸杂乱。他喜欢旅行，想借此积累生活经验，这对他的创作有好处。西蒙娜向往冒险的生活，离经叛道，以及一切过激的行为，毕业对她来说意味着解放，她从此可以离家外出，独自生活，1929年10月份将是她

生活的新开端。

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作家，但是十五岁那年，她在一位女友的纪念册上用潦草的笔迹写道，她希望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十八岁时，她跃跃欲试地动笔写了第一部小说的最初几页。她打算写一个十八岁姑娘如何整天被一种念头纠缠着，想要摆脱别人对她的好奇心。萨特曾取笑她那套从教区学校里学来的词汇，虽然他也承认自己在文学领域里正需要“获得拯救”，以提高写作能力。

西蒙娜喜欢萨特，因为他从不停止思想，他对任何事情都绝不想当然地下结论。另外一点原因更为主要，西蒙娜对她自己的兴趣，超过了对其它问题的兴趣；而萨特总是能够努力根据她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观点来理解她。他对她说，她应该坚持自己的个人自由，应该保持好奇心和开放态度，切实地做一些类似写作这样有意义的事情。萨特比她只年长两岁半，但是显得十分成熟，这一点给她留下的印象最强烈。西蒙娜的表兄雅克是她青春期感情萌动时第一个迷恋的对象。玛厄是第一个称赞她身材优美的人，萨特却是第一个真正喜欢她的男人，而且喜欢到入迷的程度。他们两人在各方面提出的要求完全吻合一致，不过他的